理力量，还将推进日间照料中心覆盖到每个街道，智慧看护系统将面向全区80岁以上独居老人，意外伤害保险将走进全部85岁以上高龄老人家庭。  
　　新的一年，更多老人们将收到这份“大礼包”。  
　　本报北京2月21日电  （记者陆娅楠）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2月21日，铁路春运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180万人次，同比增长7.6%，铁路运输安全稳定有序。  
　　2月20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069万人次，同比增加90万人次，增长9.2%，开行旅客列车8214列，加开临客914列。其中上海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166.0万人次，南昌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86.2万人次，广州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146.4万人次，成都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111.9万人次。  
　　南昌局集团公司增开南昌、九江、萍乡、厦门、福州去往广州、深圳、汕头、上海、温州等方向旅客列车41列，在江西、福建两省间加开旅客列车46列。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在乌鲁木齐至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城市的图定列车上，采取加挂车体的方式提升运能，累计加挂车辆13辆。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加开临客28对，其中加开哈尔滨至北京方向高铁临客9对。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在开行128趟普速列车的基础上，开行32趟短途动车组列车。西安局集团公司加开3趟务工专列，方便川陕地区务工人员出行。成都局集团公司加开列车113列，优化开行方案，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北京局集团公司与北京市交通委积极沟通，在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增加开行夜间公共交通线路，根据客流情况采取增加车次、延长运营时间以及多样化接续摆渡车等措施。济南局集团公司在管内各大车站设立“外出务工人员售票窗口”。广州局集团公司长沙火车站组建学雷锋服务小分队，为重点旅客提供预约送站、爱心接力和购票引导、乘车指引服务。  
　　本报南宁2月21日电  （记者庞革平）2月20日，1000多名广西河池务工人员乘坐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公司开行的K4718次专列前往广东佛山。迄今，南宁局已连续15年开行节后务工人员返程专列。  
　　在客流大站和外出务工人员集中地车站，南宁局集团设置了务工人员购票专窗；同时开行移动售票车，主动到管内厂矿企业、工业园区上门为外出务工人员办理车票事宜。据介绍，广西节后返程外出务工专列从年初四开始运行，每天开行8列，日均可增加运能1.1万人次。  
  
　　有的人急匆匆往家赶，有的人总想着出去玩，有的人学起传统年俗……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过年的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年轻人固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过年的方式，但是千百年来春节背后的文化基因仍然深入骨髓。过年最重要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怎样才能更好地传承春节的内涵？如何创新形式让春节焕发魅力？把春节过出时代感和青春范儿，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过年的关键词。  
　　过年最重要的是亲情与陪伴  
　　无论路途有多遥远、春运的列车有多拥挤，无论是否准备好了应对七大姑八大姨的关心，只要一到春节这个时间节点上，回家的脚步就变得急促起来。“一年不赶，赶三十晚”“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团聚，可以说是过年最大的意义。  
　　“小时候对过年的印象，就是一家人围着电视看春晚、包饺子。而现在，选择多了，有时候也在饭店包桌吃年夜饭，有时候也带着父母孩子一起外出旅旅游。”河北邯郸的张昊说：“虽然很怀念以前那种对过年的憧憬，但实际上，不论方式如何演变，过年的核心要义都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亲情与陪伴。”  
　　“与其宅在家里看电视，或者出去逛街、聚会，我更乐意趁着放假，与家人一起出去玩，这两年我们都是这么过的。只要家人在一起，哪里都有年的感觉。”河南郑州的韩昭说：“因为平时工作忙、节奏快，所以没有很多时间陪父母，更别说带他们一起旅游了。好不容易过年有空，一家人一起去感受各地的风土人情，感觉很开心。”  
　　“如今家庭的规模不如从前大了，庞杂的亲属之间的登门拜访也随之减少，过节习俗也变得相对简单起来。这就给以小家庭的团聚留下了更多的时间。”武汉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陈闻晋表示，有些年轻人虽然过年在家，但不是忙着玩游戏抢红包，就是想着与同学聚餐看电影，难得与家人说上几句话。如果相聚只是空间距离上的拉近，而不是心灵的互相安慰，那么过年回家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身边总有人抱怨，春节越来越没有年味儿了。然而事实上，年味儿也是自己调制出来的。春节诚然应该有特色的民俗活动，但即便在生活的细节之中，年也依然可以因情感的交流与亲情的汇聚而过得有滋有味。  
　　传承春节的民族文化底色  
　　在广西，“舞春牛”作为春节里的一项游艺活动，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寄托着人们对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的美好祝愿。“牛身用竹片编制，黑布或灰布做套，绵纸做头和角，画上眼睛。两人一头一尾钻入布套中，边唱边舞。”乡下的老年人一边讲述“舞春牛”的方法，一边感叹“如今的年轻人都不再学这些‘土掉渣’的玩意儿了。”  
　　像“舞春牛”这样的年俗活动，如祭灶、拜年、贴春联、挂年画、放鞭炮、踩高跷、滚铁环、舞龙灯等，可谓多如繁星。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少春节习俗，渐渐被人们淡忘。  
　　“过年方式的变化是由社会的变化决定的，民俗的流失是年轻人对文化的一种重新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罗红光认为，在不同的时空里，春节表现出种种不同的形态，而今天，人们可以选择的过节方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样化、个性化。年轻人在传统的节日中加入现代元素，其实是中国民俗文化对现代生活的一种适应。  
　　不过，无论时代怎么变化，那些通过春节沉淀下来的民族文化心理，仍然深植于我们的内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铁梁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代，在我们的年文化里，首先尊崇的都应该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阖家团圆、亲善为道的价值观。年轻人最应该做的，是继承春节这个节日中包含的底蕴和价值选择，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让心灵得到安顿，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意义。  
　　如今，民俗文化与旅游业的结合，也为民俗的延续开辟了一条新路。浙江诸暨，老戏台上的越剧演出，令人流连忘返；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的架水节、踩桥仪式、苗族歌会，每年开展得如火如荼……传统年俗正在重新焕发生机。  
　　激发传统节日的青春活力  
　　春节期间，辽宁省朝阳县哈拉贵村的许景礼特别忙。平日里，他是一名村医，过年时他就成了村里剧团的导演。“小时候天天盼着过年，盼着小剧团演出。可后来，村里有了电视和网络，年轻人对小剧团渐渐没了兴趣，过年在家也总是玩手机。”许景礼说，“但剧团毕竟是村里的一张名片，不能让它就这么消失了。”  
　　怎么才能让大家重拾对剧团、对过年的兴趣？许景礼说：“必须得创新。我把身边的人和事写进剧本，让大家一起来参与演出，还将流行的小品、三句半等元素融入其中，贴近生活、幽默风趣，大家自然也就看得开心。这两年的‘村晚’，真是越办越红火。”  
　　事实上，对于以春节为代表的传统节日，年轻人并不是不喜欢，只是社会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风俗的某些方面也不再与今天的生活相吻合。当节日的内涵与时代慢慢脱轨时，这些节日便显得有些“没了味道”。因此，传统风俗的传承也应当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式。  
　　在广州，人工智能技术走进迎春花市，只要在线下拍摄一张植物照片，小程序就能够立即识别出花的详细资料，如此一来，每个逛花市的市民都成为识花达人；在太原，灯彩嘉年华在年节民俗板块之外，开辟了国际动漫板块，让人们领略到G20环球灯会制作班底的能工巧匠带来的视觉盛宴……  
　　“文化遗产、文化传统也是一种文化资源，只要我们经营得法，它就有着巨大的文化影响力。”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萧放认为，我们应该善于将春节期间的家庭民俗与社会民俗衔接起来，对传统节俗进行传承或创造性转换。比如过年期间的某一天，小区居委会可以筹集新年团拜会，让平常来往稀少的居民有一次面对面的接触机会，让他们感受近邻之间的友善；比如正月十五，观灯看人是传统民俗，今天我们也可以用假面舞会、游逛街景的形式创新这一节日活动项目。  
　　近年来，每到过年，总会有人抱怨年味儿越来越淡，认为传统节日与习俗不断被消解遗忘，同快餐式消费文化的兴盛有很大关系。但是，完全归咎于此则未免偏颇。  
　　我们更该看到，中国传统节日本身对社会人群尤其是年轻群体吸引力的减弱，给了快餐式文化消费的侵入以可乘之机，这是年味儿变淡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很多年轻人眼里，春节就是吃饺子，元宵节就是吃汤圆，端午节就是吃粽子，中秋节就是吃月饼……传统节日几乎成为“吃”的代名词，这本没有错。在工业时代到来之前，中国属于农业社会，人们以土地为生，生活地域固定，经济并不富裕，于是选择在年末举行仪式，祈祷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便是春节最初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反映的是对富足与安定的经济期待，“吃”也是题中之义。  
　　时过境迁，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生产力极大发展，人们从田间地头解放出来，走出乡村，闯荡世界，社会流动大大加速，春节更多代表了年末与亲人的相会，对家人的陪伴，折射的是对团圆与欢聚的情感需求。今年春节前，陈可辛导演的短片《三分钟》走红，正是契合了这种情感需求。社会背景悄然变化的同时，如果传统节日仍不能与时俱进，而是过多地停留在经济期待层面，吸引力下降实属必然。  
　　要提升传统节日的吸引力，一味指责快餐式文化消费心态和方式只能图得口舌之快，根本上还得从现代人的心理和情感需求方面下功夫，不能为了过节而过节，而要满足人的诉求。  
　　在这方面，迪士尼的成功或许能提供一些启示：并非只为孩童服务，而是把握了成年人内心对童年快乐的回忆，那种纯真无邪的渴望，切中每个人的情感诉求。此外，迪士尼对产品的品牌资源开发，不是停留在实现商品使用价值的单一层面，而是尽量挖掘产品背后的形象、故事、情感等诸多文化资源，实现多维度的开发利用。  
　　以此类推，春节等传统节日可以看作一个早为国人接受认可的大文化品牌，我们也能在把握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发掘大文化品牌之下的众多文化资源，将形象、故事、情感等内容贯穿其中，丰富节日的表征和意涵。  
　　其实，在古代，元宵节又叫上元节，除了传统的放焰火、看花灯、吃汤圆外，还是青年男女约会的甜蜜节日，近乎中国古代的狂欢节，辛弃疾著名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便创作于元宵佳节。一个传统节日文化品牌囊括了放焰火等活动文化资源、约会等情感文化资源，即便放在现代，也一定会大受年轻群体欢迎，效果绝不会亚于各种西方节日。  
　　不论是清明节的踏青祭祖、端午节的临江悼亡，还是中秋节的阖家团圆、重阳节的敬老登高，列数中华民族诸多传统节日，都蕴含着丰富多元的文化元素，珍存着代际族群的时空记忆，折射着千百年来积淀凝聚的文化认同，体现着中华民族应有的文化自信，只需留心发掘，假以时日必能获得应有的文化吸引力。  
　　前不久，一则题为“皮草女因多花两块钱闹停公交‘碰瓷’民警”的视频出现在各大新闻网站。视频中，一辆福建泉州的公交车上，一名身穿粉红皮草上衣的女乘客因车费问题当场大闹。不少网友对该乘客的不文明行为进行了批评，但留言中也夹杂着一些令人尴尬的内容，比如：“别以为穿得起皮草就多了不起！”“穿皮草的素质还不如东北人！”  
　　曾几何时，关于“东北人”的各种段子不仅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也为不少网络媒体所热衷。在这些段子里，“东北人”的形象被恶搞得夸张、负面和可笑。一时间，“东北人”仿佛成了任人信手拈来的笑料。  
　　有心人一定记得，其实早在“东北人”之前，“河南人”就沦为上一拨被嘲讽的对象。几年前，人们提起“河南人”，似乎就代表着不忠厚、不老实，不少网络媒体也出现过许多类似的段子和文章。以偏概全的偏激和成见，给“河南人”“东北人”贴上了莫须有的标签。  
　　如果说“河南人”“东北人”反映出的还只是长期存在的地域歧视问题，那么近期以来，一些网络平台和媒体上频频出现的、给某种个体行为扣上群体“帽子”的事件，则越来越多。比如在这则题为“皮草女”的视频中，网络媒体之所以强调“皮草”二字，想必是为了强调这位女乘客的财富背景，毕竟对大多数人来说，穿“皮草”是有钱人的象征。于是，不少网友果真掉进了网络媒体设置的文字陷阱，对不文明行为的批评转而变为对“皮草加身”的攻击。在这种被扭曲的逻辑下，“皮草女”代表有钱人，“皮草女”不文明意味着有钱人素质低，对个体行为的批判演变成对某一类人、某个群体的非理性指责。  
　　媒体是社会情绪的放大器，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交织，舆论环境复杂，媒体上出现的一字一句一个画面，都可能将公众情绪和社会心态引向未知的深渊，带来严重的后果。网络空间引发的矛盾，可能直接导致线下真实社会的不安定。客观报道、真实呈现，是媒体自诞生以来就负有的使命，在网络空前发达的今天，客观真实尤为重要。  
　　就拿网络上流传甚广的“鄙视链”来说，一些人盲目地“鄙视”某个地域的人、某个行业的从业者、具有某种特征的群体，殊不知这种“鄙视”本身才是最无知、最情绪化的。媒体不但不应当在遣词造句中放大“鄙视”效应、激化社会矛盾，反而应该通过正面引导，帮助人们的认知和情感归于理性。别为了点击率、收视率瞎“扣帽子”制造话题，是媒体在今天必须恪守的基本职业道德。  
　　“访学的过程是学习的过程，若不是这个项目，我不会对中国有这么深入的了解。”不久前，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巴基斯坦青年记者访学项目结业仪式上，《今日巴基斯坦》访学记者哈桑·艾尔沙德如是说。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相关国家在教育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活跃，而新闻媒体及记者的交流更为各国间民心相通增添了一抹亮色。2016年7月，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以下简称《教育行动》），提出“聚力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形成平等、包容、互惠、活跃的教育合作态势”，要“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人文交流，不断推进沿线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自2014年起，该校新闻学院陆续举办了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非洲、南亚—东南亚等4个外国记者长短期访学和交流项目，通过主题讲座、实地参访、文化体验等活动推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媒体与中国媒体的对话与合作，进而增强双方人民的交流和理解。  
　　在《教育行动》的指引下，除了这样长短期访学和交流项目，人大新闻学院还在去年设立了“一带一路”全球新闻传播（全英文）硕士项目，基本年限为2年，不少于35学分，定位于培养新媒体环境下的海外非中国籍全球新闻传播高端实践人才。本项目除了涵盖一系列中级和高级新闻传播专业课程，还为学生提供汉语培训，以及介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配套课程。学生第一年聚焦于课堂学习、报道实践与媒体实习，第二年则可自主选择论文撰写或毕业设计。  
　　来自俄罗斯的维多利亚·卡兰斯卡娅是人大新闻学院的一名硕士生。“第一次来到北京就爱上了这个城市，爱上了中国和中国文化，就决定本科毕业以后一定要来中国。”维多利亚现在对这段经历颇为满意，计划未来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媒体工作。  
　　越来越多像维多利亚这样的留学生，正因为这种理由来华留学，在中国校园汲取养分。全球化智库（CCG）等机构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指出，2016年来华留学生数量达到44.3万人，较2015年增长11.3%。相比之下，美国高等教育机构2016至2017学年新录取留学生较上学年同比下降3.3%，新录取留学生人数出现负增长。  
　　仔细分析来华留学数据会发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成为来华留学增长点。《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显示，在中国国际留学生的前15名来源国家中，大多数为“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来华留学生人数增长最快的国家包括泰国、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老挝，增幅平均值超过20%。留学生数量快速增长的背后，是《教育行动》及高等院校的合力推动。  
　　然而，漂亮的数字并不能掩盖各高校在“一带一路”教育事业发展中存在的短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毕诚认为，一是培养目标狭隘，培养的人才主要在国内就业创业，对外开拓性人才严重匮乏；二是教育交流主要是向国外输送生源，教育输出的中国文化是碎片化的，人力资源和创新技术的输出极其有限；三是课程改革看重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课程改革互不相关，缺乏对国际化课程体系的深度了解，教学质量大多未达到国际化水准。  
　　“一带一路”倡议打开了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新局面，在提升东部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中西部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如何保证推进对外合作项目所需的外向型人力资源和创新人才快速跟进，怎样建立人力资源和人才聚集的长效机制，怎样推进不同地区的教育向各种国际化人才培养需求方向转型……已经成为我国教育深层改革的新课题。  
　　“虽然这里只是5名学生的小课堂，但他们背后可能是5亿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作为巴基斯坦记者访学项目的授课教师，人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这样阐述该项目的意义。  
　　其实，在高等院校大力推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同时，相关实践同时也倒逼着高等院校的教育与国际接轨，自觉或不自觉地提升教育国际化水平。然而，形成这样的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并非易事，教育国际化必须面对国内经济转型升级以及对外拓展的双重压力，也需与教育结构、学校布局、人才培养计划等密切联动。在此基础上，破除教育模式同质化难题，推进区域教育人才培养特色化建设，加强实用人才培养和劳动者专业技能培训，或许是我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如今，南京大学灯火通明的化学实验室里，再也见不到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2016年11月19日，带着对化学事业的依依不舍，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无机化学家、南京大学教授游效曾逝世，享年83岁。  
　　游效曾，江西吉安人，祖父取“效法先贤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之意为他命名，而他一生都践行着祖辈的期冀——严谨治学、忘我耕耘。他热爱祖国，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崇尚科学，坚持真理，淳朴善良；他淡泊名利，默默耕耘，将心血奉献给化学教育与研究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把中国无机化学落后的时间抢回来！”  
　　游效曾与化学的缘分，长达67年。  
　　15岁那年，他就读于南昌联立一中。一节化学课上的酸碱滴定实验中，溶液在加入一滴指示剂的瞬间，仿佛被施了魔法般变换奇异色彩，游效曾被迷住了，从此对化学产生浓厚兴趣。  
　　高中毕业后，游效曾考取武汉大学化学系。1955年夏天，大学毕业的游效曾由于成绩优异被推荐至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他买了张睡在甲板上的船票，带着一张“贫困生”证明和一卷旧草席，顺江而下来到古城南京。  
　　来到南京大学，游效曾明白，研究化学必须把数理基础坚实起来。年少气盛，他拿着选修数学、物理系课程的申请表，直接找到时任化学系主任的戴安邦教授。“化学是门实验科学，如果只埋头搞理论而忽视实验，是不可能搞出成果的！”戴教授发自内心地欣赏这个“好苗子”，也不失时机地“敲打”他一下。这番关于实验与理论的道理，深深印在了游效曾心里。两年间，他埋头于东大楼地下室一间面北而潮湿的房间里专心做学问，除了实验，数理课程也全部考了优秀。  
　　1957年，游效曾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南京大学当助教，师从李方训院士，从事电解质溶液理论研究。其间，游效曾负责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电化学和分析化学的教学工作，独立主讲《物质结构》和《结晶化学》等化学系基础课，打破了专业界线，奠定了深厚的化学基础，开拓了广博的知识面。即使在“文革”的艰难岁月里，他都凭着意志，完成了我国首部《结构分析导论》的初稿。  
　　改革开放后，游效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80年，他作为国家教委选派的早期访问学者赴美进修。一踏上美国这片新奇土地，游效曾就觉察到我国在配位化学和无机化学领域与世界的差距。“我把中国无机化学落后的时间抢回来！”他暗暗咬牙，如饥似渴地做实验，常常用功到夜半。为了让中国尽快引进科学前沿知识，游效曾组织翻译了美国、英国研究生必读配位化学领域的新专著，大大促进了我国无机化学教学和研究的多元性。  
　　大树日渐参天，学成的游效曾，却婉言谢绝了导师劝他留在美国工作的好意。1983年，游效曾回到深爱的祖国，担任南京大学配位化学研究所所长，以全部精力投入我国配位化学的基础研究工作。  
　　“科学没有捷径可走”  
　　何谓配位化学？它是现代化学中无机和有机化学等学科相互渗透的交叉学科，涉及范围和应用领域非常广泛：医学上用于治癌，冶金上用于萃取，轻工业上用于添加剂，农业上用于化肥，而在高新技术领域，在发展分子超导、磁体、发光固体等分子材料方面，都有着广阔前景。  
　　在这一重大领域，游效曾率先在我国提出了“光电功能配合物”这一研究新领域，并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取得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卓越成就。他十年磨一剑，1991年因在“配合物合成、结构和性质”方面的成就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2004年，他负责完成的“光电功能配合物及其组装”研究，再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他还参与创建了“配位化学研究所”和“配位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并长期指导配位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研究，两次获得科技部“国家重点实验室金牛奖”，为我国配位化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科学没有捷径可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惊人的毅力编著了《结构分析导论》《配位化合物的结构和性质》《分子材料——光电功能化合物》等专著，成为国内这个学科教学和科研的必读著作，他扎实的基础理论功底和渊博的知识，为中国化学学科的知识宝库注入了宝贵的财富。他组织和翻译了《过渡金属化学导论——配位场理论》《群论在化学中的应用》《化学中的物理方法》等国外知名学者著作，促进了我国配位化学、结构化学、量子化学理论的教学与普及，让国内化学家走到了世界化学前沿。  
　　即使年届80岁，他还连续修订了自己的两部专著，其中《配位化合物的结构和性质》一书88万字，《分子材料——光电功能化合物》一书90万字。这样艰深的专业书籍，编辑看不懂，学生里也找不到能把关校对的人，全靠他自己一字一句修改，从一校到三校，其难度和工作量无法想象。很多人更不知道，20多年前，他的一只眼睛就已完全失明，数百篇论文，四五部专著、译著靠的居然都是一只眼睛，即使是大手术后体重不足50公斤，他仍然昼夜伏案。  
　　“不把科学做到极致，又如何能教到极致？”  
　　满头银发的游效曾，仍记得自己13岁那年，有幸聆听南京大学校友、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教授做报告的事情。  
　　“这就是物理学家吴有训！”年少的游效曾很震撼，吴有训教授那和蔼可亲的态度，对科学的执著，“大大地激发了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的热情”，他暗暗下决心，做学问就要像吴教授那样！  
　　60余年来，这位我国著名的化学教育家，先后担任“物质结构”“结晶化学”“结构化学”等基础课和“结构研究方法”等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工作，学生中涌现出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优秀世界青年科学家等，为化学界输送了大量科研人才。  
　　“不把科学做到极致，又如何能教到极致？”何谓极致？学生们还记得，那是每次把论文交上去，第二天一早就能收到老师的修改，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批注；那是深夜十一二点接到电话，老师很激动地提出一个想法，要学生尽快做起来，因为“能第一个做出来才算本事”；那是老师一遍遍不厌其烦地讲解群论、能带理论、配位场理论及各种谱学原理，告诫学生们一定不能丢掉基础理论，“现在做化学的人一味强调实验技巧，基础不牢，何以创新？”……  
　　“我的‘长寿秘诀’，就是看文献！”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的游效曾，经常这样“炫耀”。几十年来，游效曾没有节假日，大年三十春晚开播了，他还是不肯回家。出差开会，飞机、汽车上，哪怕是肝移植后躺在医院里，他都又看起了专业书和学生论文，甚至和医生风趣讨论起“药物的分子结构和机理”。太过专注的游效曾，经常闹笑话。有一次，他和同事做晶体结构实验，两人的鞋子穿错了3天才发现；搬家快两年了，他还会不知不觉回去老房子，无论如何都不能把钥匙塞进锁孔。  
　　有学生不解，游效曾就讲起自己的人生经历。因为历史原因，到了50多岁，他才真正有机会开始做科研。“如果我能再有十年二十年时间，我一定能做出很重要的发现。你们很幸运，年纪轻轻就可以专心做科研，一定要珍惜机会！”  
　　2016年底，一次会议上，游效曾对年轻学者的工作做完指导后，溘然倒下，倒在了他自己热爱的事业上，倒在了一群热爱他的学者面前，走完了他的漫漫化